

理工院校国学通识教育系列教材

总主编 冯希哲

主 审 张新科

诸子经典导读

王晓鹃 冯希哲 主编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理工院校国学通识教育系列教材

总主编 冯希哲

主 审 张新科

诸子经典导读

王晓鹃 冯希哲 主编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诸子经典导读 / 王晓鹏, 冯希哲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6

理工院校国学通识教育系列教材

ISBN 978 - 7 - 303 - 15643 - 6

I. ①诸… II. ①王… ②冯… III. ①先秦哲学—高等学校—教材 IV. ①B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9278 号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印 刷：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 mm×230 mm

印 张：21.5

字 数：360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5.00 元

策划编辑：马佩林

责任编辑：刘乐新

美术编辑：焦 丽

装帧设计：毛 佳

责任校对：李 茜

责任印制：陈 涛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：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：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：010-58800825

目 录

第一章 儒 家	1
第一节 儒家简介	1
第二节 儒家代表人物	20
第三节 儒家著作选读	30
第二章 道 家	55
第一节 道家简介	56
第二节 道家代表人物	68
第三节 道家著作选注	81
第三章 墨 家	104
第一节 墨家简介	104
第二节 墨子	116
第三节 《墨子》选释	130
第四章 法 家	148
第一节 法家简介	148
第二节 法家代表人物	166
第三节 法家作品选讲	180
第五章 名 家	196
第一节 名家简介	197
第二节 名家代表人物	210
第三节 名家著作选解	223

第六章 纵横家	240
第一节 纵横家简介	240
第二节 纵横家代表人物	259
第三节 纵横家作品选介	267
第七章 兵 家	287
第一节 兵家简介	287
第二节 兵家代表人物	305
第三节 兵家作品选析	319
后 记	335

第一章 儒 家

儒家是先秦时期孔子所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。在先秦诸子百家中，它高居“显学”的首位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正统思想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

“儒”的名称在商代即出现，是指从巫、史、祝、卜等宗教职业人员中分化出来并专为贵族人家主持礼仪的知识分子，在春秋时期则演变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。“儒学”一词产生较“儒”稍晚，是指由孔子创立的，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学术思想。儒学经千百年的发展，逐步演变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，是我国绵延时间最长、思想体系发展最完备、对我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学派。

春秋时期，由于周王室日渐衰落，“礼崩乐坏”，原来由王室控制的文化逐步下移，形成诸侯国多元文化并肩发展的局面，即所谓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，由此产生许多不同学术派别。在楚国，形成了以老聃为创始人的道家学派；在鲁国，形成了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；在宋国，形成了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。以后各家并起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儒学也就在与各家的争鸣中发展，并未能凌驾于诸学之上。儒学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。

中国儒学从产生至今，大体经历了先秦儒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到明清的实学与考据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
第一节 儒家简介

一、先秦儒家发展概况

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、孟子和荀

子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进行公开教学的大教育家，他把古代为贵族专有的礼仪和其他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，并整理了诗书礼乐一类的古代文化资料，成为儒家经典。孔子的学说是继承与发展西周社会“以德配天”文化传统的产物，其基本特征是以“仁”为核心，以“礼”为行为规范，以“天命”为哲学根据的理论体系。孔子的部分学生相继设教讲学，逐渐形成儒家学派。孔子死后，儒分为八派，称为儒家八派。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经曾子、子思三传至孟子的一支，被尊为儒家正宗。孙氏之儒即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，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，接触各家思想较多，因此其思想中吸收了不少其他学派的思想，与孔孟的思想有所不同，长期以来，他的思想不为正统儒家所重视，被看作是儒家的别派。

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各自的理论建构有所不同。孔子继承传统的“仁”的观念，提出了与仁相关的若干概念，并将其熔铸于一炉，建构起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仁学体系，对中国古代仁学思想有开创之功。孟子对孔子的仁学体系进行了性善论证，对孔子提出的与仁相关的众多命题进行了系统规范，提出了内容更加全面的性善论、仁德修养论和仁政学说。因此，孟子的学说重在丰富与完善。而荀子则一方面继承孔子的仁学主张，另一方面又广泛吸纳各家思想，特别是法家的人性论和礼法思想，对孔子的仁学进行人性新论证，构筑了仁礼、德刑、赏罚、王霸并用的新体系，其学说重在改造，而改造后的儒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影响更大。荀子本人就培养出两位高徒：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，他的君主专制理论直接成为秦王朝治国理天下的指导思想；李斯则成为著名的政治家，直接推动着秦的统一，规范着秦统一后的大政方针，对秦代政治有重大影响。在后来整个封建社会里，统治者兼用儒家和法家思想。下面分别对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思想做一介绍。

二、孔子的思想

孔子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，社会关系处于新旧交替之中，他不满意这种“天下无道”的局面，一心要加以改变，变“天下无道”为“天下有道”，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这个目标。他认为，要使社会恢复安定，根本的途径是进行道德教化，使百姓能自觉遵守“礼”所规定的社会秩序，这就是他的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他提出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。

他提倡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认为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① 他提倡孝悌，认为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点。他重视教育，把教育当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。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：“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可见他设教授徒，正是为了培养一批能够在上位实行统治的人，从而影响政治，实行他的政治主张。这样，政治、道德、教育三位一体，就构成了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主干。

（一）“仁”的学说

仁学，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，也是孔子在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。仁，不仅是孔子的道德思想，也是孔子的社会理想，仁学有着丰富的内容。孔子谈“仁”最多，一部《论语》讲到“仁”的地方就有 109 处。在不同的场合，他对“仁”的解释往往不同，要准确了解孔子“仁”的含义，要注意把这些不同的解释联系起来，融会贯通。孔子对“仁”的解释，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条。

1. “克己复礼为仁”

这是以礼来规定仁。什么是仁？仁就是要依礼而行，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这是对仁的总体的规定。

2. “孝悌为仁之本”

孝悌反映了当时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。西周实行分封制，天子为全国之主，按血缘宗法关系分封，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便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。而在宗法制度中，基本的关系是父子、兄弟之间的关系，天子与诸侯、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，同时也就是父子、兄弟之间的关系。维护这种关系不受破坏，是礼的根本，孝悌的作用也正在这里。所以说其为人孝悌，就不会犯上作乱。孝悌是仁的根本，意义也正在于此。

3. “爱人”

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’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爱人，不是具体的规定，而是一种精神，它是仁的基础。然而，这种爱也并不是抽象的普遍的爱。孔子讲爱人，与礼、与孝悌是相联系的。所以爱人首先是亲亲，也即是体现在孝悌上，爱是有差等的。孔子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指出了爱的差等、次序。

① 以下《论语》引文，皆出自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7。



山东曲阜孔庙

4.“忠恕”

“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，‘唯。’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。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忠恕是待人的态度，是爱人的具体体现。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这是说的“忠”。《论语》又说：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这是说的“恕”。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自己要自立，也帮助别人自立，自己要通达，也帮助别人通达，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说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自己不愿意的，不要加之于别人，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。总的原则是一个，就是推己及人，将心比心，就近以自己的心作比而推及别人。所以说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”。

孔子关于“仁”的这四条规定，有具体的规定，也有一般的原则、精神。“克己复礼”的“礼”是具体的，“孝悌”反映了当时的宗法制度，是礼的基础，也是具体的。这一些具体的内容，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，也是变化的。后代的儒家，也并不主张按孔子当时讲的礼去做了。爱人、忠恕，是仁的一般原则和精神。“克己复礼”的具体规定中也包含着一般的原则，这就是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。仁的学说，是讨论人如何立身处世，是以个人为中心，从个人出发的。但孔子不把个人看作孤立的单独的个人，而是把他看作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。仁，就是要处理好个人与他人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。爱人、忠恕、推己及人，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，就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般原则，就是仁的基本精神。

孔子所讲的“仁”，也不仅是道德思想，还有更广泛的意义。仁又具有政治的意义，代表了一种施政的原则。孔子说能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五者于天下就可以为仁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“仁”又还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境界。孔子的理想，是要弘扬仁道，使社会上人人都自觉接受仁道，躬行仁道，这样也就达到了理想的社会境界。孔子把这也叫作仁。孔子说：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这里所说的仁，都是指的这一理想社会境界。所以，仁，既是最高的道德范畴，又是整个道德思想体系的总称；既是为政的指导原则，又是理想的社会境界。仁学既是道德思想，又是政治思想。

（二）孔子的德治思想

为了实现其复兴周道的目标，孔子提出了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孔子又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这段话集中地说明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。在这里，孔子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：一是德治与法治、道德教化与刑政的关系；二是德和礼、道德自觉与制度、规范的关系。

1. 德与刑的关系

德治与法治，是当时两种主要的、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。孔子比较这两种主张，认为依靠法制、刑政，虽然可以使百姓出于害怕而不敢做坏事，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，自觉不做坏事。而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依靠德治，则可以起到刑政所不能起的作用，使百姓有知耻之心，自觉从善，走上正道。

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对于道德的作用、道德与法治的不同特点的最早的说明。从这一点出发，孔子说：“政者，正也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把政治归结为一个“正”字，认为为政就是正己正人。而在这二者中间，关键是在位的统治者能首先正己。他说：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只要当政者自己能正其身，那么，自己的道德就会像风吹过草地使草倒伏一样，影响百姓自觉从善；相反，如果自身不正，那么就会“虽令不从”，靠行政命令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对当政者提出道德要求，强调正人先要正己，是很深刻、很重要的；但同时他把为政归结为“正”，也是夸大了道德的作用，把政治道德化了。

对于刑杀，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讲。他曾经肯定了郑国“尽杀萑苻之盗”的做法，提出过宽猛相济的主张。他说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，猛则

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”（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）但他基本的思想是重德輕刑。“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：如殺無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對曰：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……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可見他還是希望用道德教化來代替刑殺，他的理想目標是建立一個消除了殘暴行為，既不需要刑殺，又不需要訴訟的社會。只是因為這樣的理想的實現，需要“善人為邦百年”，非一日之功，退而求其次，才以寬猛相濟作為一種過渡辦法。在這兩方面中，德教始終是基本的，刑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一種補充手段。

2. 德與禮的關係

對於德治，孔子把它概括為“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，把“道之以德”和“齊之以禮”當作德治思想的兩個方面。這就提出並說明了德和禮的關係。孔子所說的德，就是指仁；德和禮的關係，也就是仁和禮的關係。

“齊之以禮”是以禮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，是孔子的政治目標。《論語》說：“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要求人們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”，這就是“齊之以禮”，同時也就是仁的要求，仁與不仁，要看視聽言動是否符合禮的要求，如果視聽言動違禮，也就是違仁。《論語》又說：“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‘無違’。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‘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：‘無違’。’樊遲曰：‘何謂也？’子曰：‘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’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提倡孝，是道之以德。而孝就是事之以禮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，可見提倡孝，道之以德的目的是要齊之以禮。

孔子認為，禮制關於玉帛、鐘鼓的規定，只是禮樂的形式，而人的道德感情和思想，才是禮樂的真正內容和靈魂。人如果不仁，禮的種種規定，就都徒具形式，失去了意義。所以，也只有道之以德，才能真正做到“齊之以禮”。一方面，孔子說孝就是事之以禮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；另一方面，在講到奉養喪祭的時候，又強調了哀和敬，說與其礼仪上非常完备，但是哀、敬不足，不如礼仪上比较简易甚至稍有欠缺而有真诚的哀、敬之情。這就說明了齊之以禮要以道之以德做基礎，這正是孔子德治思想與依靠刑政治國的根本不同之處。可見，禮與仁是統一的。仁是內心的道德情感，禮是外在的行為規範。仁是禮的基礎、靈魂，禮是仁的體現、落實。沒有仁，禮就徒具形式；沒有禮，仁就無所依託。道之以德，是要人們“非禮勿視，非禮

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是齐之以礼的基础和手段；齐之以礼，又可以使民德归厚，也是道之以德的一种手段。仁与礼互为表里，相得益彰；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，互为手段，相互促进。这就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。而在礼和仁这两方面中，关于礼，孔子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虽然有所损益，总体上说，礼是古已有之的。而仁，虽然是“古已有之”，但作为一种系统的道德思想体系，却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。把德和礼联系起来，把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统一起来的德治思想，也是孔子首先提出的。他认为，当时所以礼崩乐坏，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缺乏遵守礼的规定的自觉要求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，强调把礼的执行建立在仁的基础上，赋予礼以道德的品格，把外在的强制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。这就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实质和它的意义所在。他的这种主张，确实指出了一条保持社会秩序稳定、巩固的合理的途径，使他成为不同于当时一般统治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家。所以，虽然仁和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，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，孔子在思想史上做出的新贡献是他的德治思想和仁的思想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虽然“齐之以礼”是孔子的目标，而孔子所最关心和讲得最多的，却是仁，是道之以德。孔子这样的政治思想，从“齐之以礼”这方面看，他对当时社会的变革痛心疾首，一心要恢复礼的尊严，他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，从“道之以德”这方面看，他提出的主张是合理的，表现出在对社会发展和治国之道的认识方面的很高的智慧，是认识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和革新。

（三）教育思想

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他创立了我国第一所私学，毕生以他的主要精力从事教育。孔子的弟子中，既有贵族子弟，也有贫穷的庶民的子弟。孔子的教育活动，是文化下移的产物，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下移。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，又被后世尊为“万世师表”，他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。同时他的教育思想也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的、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1. 学以致其道——教育的目的和内容

孔子毕生从事教育，是他整个行道的努力的重要部分。孔子为政是行道，教育也是行道，都是为了弘扬仁道，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。孔子认为：教育是为了培养在上位的实行统治的君子，是为了能使“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”，这个目的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内容，就是礼、义、信等为治国为政所需要的政治、道德的知识和修养，耕稼、为圃的生产知识则不在其教学

內容的範圍之內。這是孔子的根本教育思想。

教育為政治服務這一點，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是非常明確的。孔子甚至說：“書云：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。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把教育就看成為政。由教育目的就規定了教學的內容，這方面，《論語》說：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“弟子入則孝，出則悌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余力，則以學文。”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文，指文獻知識；行，指德行；忠、信，是兩項重要的道德規範，孔子多次講到君子要以忠信為主，孝悌、謹信、愛眾、親仁，都是仁的要求。在所列舉的這些中，主要是道德教育，並且要在行有餘力，道德修養有餘力時，才學習文獻知識。總之，孔子教學的內容是以道德、政治為主的。

2. 求知和教育的态度和方法

孔子的教育思想里，還包含有關於求知和教育的态度、方法的豐富的思想。學習態度方面，孔子說：“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”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做學問要永遠不知足，永遠覺得自己還不夠充實，而且要有原有的學問修養會退失的危機感，切不可得少為足，沾沾自喜。孔子還強調“敏而好學，不耻下問”、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師”，做學問要勤奮、謙虛。

關於學習方法，孔子認為“學”、“思”必須結合。只有學問而沒有智慧的思想，那麼學問便不切實際，沒有用處。但若有思想、有天分，却未經過學問的培養、鍛煉，思想可能會誤入歧途，是很危險的。因而孔子提出“溫故知新”，強調書本知識須經自己理解領悟，使之轉換成真正屬於自己的可以靈活運用的知識，這是為師的前提。為學還需學以致用：“君子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君子能够會通一切詩書禮樂、典章制度的真義，並以此指導自己當前的實務，應該不會與大道相背離了。可見理論與實踐是一個相統一的過程，切不可離開實踐談理論，或者離開理論去談實踐。

在教育實踐中，孔子循循善誘、循序漸進地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教育，使學生真正“悟於己心”。他還做到了“因材施教”，根據學生不同的性格給予恰當的教育方式，使學生能夠揚長避短。“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”，“叩其兩端，舉一反三”的教育方法，旨在引導學生自己思索，這樣不但解決了學生的疑惑，而且使他們學會了思考問題的方法。

（四）中庸

中庸，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題。孔子說：“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實際上中庸並不仅仅是一個道德範疇，它反映了孔子

对世界及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，也由此而得出了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。孔子谈中庸，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。“子贡问：‘师与商也孰贤？’子曰：‘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’曰：‘然则师愈与？’子曰：‘过犹不及。’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“过犹不及”就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，由此便得出一种处理问题的基本要求：无过无不及。无过无不及就是中，就是中庸的基本要求。这是第一点。对于“中”，许多人有一种误解，常把它理解成是调和、折中，或者简单地理解成是处在中间的位置，和两端等距离。其实，中是无过无不及，是适度的意思。凡事物都有个度，适度，才能保持其性质。过与不及，就是不适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过与不及是一样的，所以说“过犹不及”。

第二点，和。《论语》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和，和谐，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方面。所谓和，就是不同事物、不同方面相互补充、相互调剂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。油、盐、酱、醋与鱼、肉放在一起，加适量的水，用适当的火候来烧，如果各种用料和水火都适度，就可以做出美味的汤来，这是和。如果只是水，一锅水，再加进更多的水，以水济水，就还是水，做不出汤来，这就是同。和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础。调味如此，音乐也如此，治国为政也是如此。为政就需要通过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相互补充、相互调节来达到政治的平和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明确地把“和而不同”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、道德原则提出来。他又说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为政要有宽和猛两个方面，这两方面互相补充、调剂，才能使政治达到“和”的境界。

从“和”可以进一步了解“中”。事物要达到和谐，它的各部分、各方面之间就必须保持一种确定的关系，这种关系就规定了每一部分、每一方面所应有的度。烹调时油、盐、酱、醋等的用量，不能是同样多少，而是按照不同菜肴的要求有一定的配比关系，决定着各种用料的“度”；为政的宽猛相济，也不是各占一半，而是要从达到“和”的要求出发来规定宽猛两方面的度。不同意见之间的和，也不是简单的折中、调和，而是“献其可以去其否，献其否以成其可”等，通过不同意见的相互补充达到正确和完善。所以，中与和，中庸这两个基本点是紧密相连的。中就是和的要求，事物的各个部分、各个方面都能适度，达到“中”的状态，事物总体才能和谐。中的要求，每一个部分、每一个方面的度，也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，从整体和谐的要求出

发，才能把握。所以中与和常连称中和。中和，就是中庸的基本要求。

对中和的追求，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基本点。《论语·尧曰》引尧的话：“允执其中”，就体现了这一点。这也是孔子“仁”的思想基础。仁的目标，正是为追求人与人之间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，仁的各种规范，正是要为各部分人在各种关系中的言行规定其合理的度。孔子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这里的“礼”就是这种度的具体的规定。《论语》讲到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时，又补充说：“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也强调要以礼节之。所以，中庸，中和，无过无不及，和以礼节之是一致的。依礼而行，无过无不及，就是仁，就是和，就是中庸。孔子所以说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”正可以从这里来理解。

和既要以礼节之，更应该知道这不是无原则的调和、折中。孔子说：“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对人有好恶，所以爱人不是无原则的爱，和也不是无原则的“知和而和”。孔子又说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乡原是指那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，孔子认为这种人是败坏道德的。把中庸理解成折中、调和，就近于乡原了，并非中庸的原意。事物各个部分、各个方面的度既是由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总体和谐的要求所规定，那么，不同部分、不同方面因其所处地位的不同，就有不同的度，对它们就要有不同的要求。孔子谈仁，谈人与人的关系，许多地方体现了这一点。讲君臣关系，孔子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对君臣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，目的则是一个：求君臣关系的和谐。对人我关系，孔子说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对人对己以不同的标准来要求，对己严对人宽。如果以责己的要求去责人，就会太严，就是过；如果以责人的要求来责己，就会太宽，就是不及。所以这不同的度不可混淆，不可颠倒。有这样来把握不同的度，才能达到中和。

所以，中庸有着丰富的内容，它的基本原则渗透在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，构成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。虽然孔子自己对中庸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和发挥，它在孔子思想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并且对后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
三、孟子的思想

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，在儒学的成熟、发展上有重要的地

位。宋儒推崇孟子，以孟子为儒学“道统”的传人，以后就把孟子与孔子并提，称儒学为孔孟之道。

(一) 性善论

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的理论基础。不了解性善论，便不能了解孟子的思想。人性问题，在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被作为独立的问题提出来讨论。孔子之后的墨子也没有讨论人性问题，而到了战国时期，人性问题却已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。在争鸣中，孟子提出了他的性善论。

孟子是在与告子的论争中论证他人性善的主张的：告子主张人性无所谓善，也无所谓不善，正如水可以引向东流，也可以引向西流一样，人也可以为善，也可以为不善，是由条件决定的。孟子反驳说，水确实既可向东也可向西，但对于上下就不能这样说了。水总是向下流，虽然也可以把水引上山，水向上流却不是水的本性。人也是如此，正如水向下流那样，人总是向善，而有的人不善，并不是他的本性决定的。所以，孟子也承认人有善有不善的现实，但他认为，人的善，是其本性的表现，不善是违背人的本性的。

那么，人性的善表现在哪里呢？孟子进一步论证：人性善，就在于仁、义、礼、智这些善的品德，是人性所固有的。只要自己自觉去追求，就可以得到，不自觉则会丢失。所以人有不善，是因为失去其本性，不能完全发挥其本性的缘故。孟子把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称为仁义礼智的“四端”，而不是直接称之为仁义礼智，并且强调要“扩而充之”，如不能扩而充之，“不足以事父母”，这就更确切、更清楚地说明了所谓人性善并不是说人人天生就是善人，而是说人性中有善的萌芽，因此人都是向善的，可以为善的。

孟子认为仁义就是良知良能，都是人性所固有，不是后天外加于人的。孟子又提到良心，用以指人天赋的本心，即人心所具有的天赋的善性。良心的观念，是与孟子性善论联系在一起的，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有广泛深远的影响。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即人与禽兽的区别的问题。孟子是从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与禽兽的区别上来把握人性的。告子认为性没有分善与不善，只是从人的自然的，或生物的本性来看人性，所以他：“生之谓性”，“食色，性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孟子反驳这种观点说：“然则犬之性，犹牛之性；牛之性，犹人之性欤？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明确地指出了，如果像告子那样，以食色、求生等人的自然的、生物的本性为人性，就不能区别人性与犬、牛的兽性。在孟子看来，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仁

义礼智等道德善性。从个人来说，如果丢失本心之善，不知把四端扩而充之，就会同于禽兽，“非人也”。从社会来说，曾经有一个时期是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”，人只是求得了生存，还没有建立起礼乐教化，那时的人，还“近于禽兽”，没有真正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。所以，孟子所说的善性，实质上是人的某种社会本性，不过孟子把这种社会本性看成了天赋的自然本性罢了。

孟子又说：“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；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、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就像人们的耳、目、口有着共同的好恶一样，人心也有共同的好恶。人心的共同所好就是理、义，就是仁义礼智。所以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

孟子的性善论，继承和发展了孔子“仁”的思想。孔子说：“为仁由己”、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、“未见力不足者”，强调了仁的修养全靠自觉修养，只要自觉努力，便可达到仁的境界。但他没有对这一点做出进一步的论证。关于人性，他只说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，没有与仁联系起来，也没有对人性做出他的说明。孟子的性善论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命题，在这一基础上对孔子的思想做了阐发。为什么“为仁由己”、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呢？孟子用“人性善”来做出了解释：这本来就是天赋的人的本性，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，自然就是全靠自觉修养，只要自觉努力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了。它的基本思想，与孔子思想是完全一致的，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。而由于性善论的提出，使孔子的仁学获得了一个理论基础，这又是儒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。

（二）仁政学说

孟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，积极关心社会现实，曾周游列国，与各国国君讨论治国之道，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德政思想，提出了更加系统、更加全面的仁政学说。

1.“定于一”的理想

孔子的理想是恢复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“天下有道”的局面。到了孟子的时代，周室已经完全无所作为，恢复周天子的权威自然也就毫无意义了。但在大国争雄、各自为政的形势下，孟子还是以中国的统一为理想的目标。孟子见梁襄王，梁襄王问：“天下恶乎定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定于一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明确指出天下的最后安定是在于实现统一。孟子与各国国君谈为